

先秦民 本思想

游唤民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秦民本思想

游唤民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秦民本思想

游唤民 著

责任编辑：占员力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 7.125印张 153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7-81031-105-0/B·005

定 价：3.95元

目 录

序.....	(1)
前言.....	(2)
第一章 殷商至西周——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	(9)
第一节 民的地位开始提高.....	(9)
第二节 观念开始转变.....	(17)
第三节 包含了未来社会一切民本思想的胚胎、 萌芽.....	(25)
第二章 春秋——民本思想的发展时期.....	(28)
第一节 民制约着君的思想的发展.....	(28)
第二节 天民观念的进一步转变.....	(44)
第三节 君民观念的进一步转变.....	(56)
第四节 民本思想得到重大发展的原因.....	(61)
第三章 孔子把民本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67)
第一节 仁——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石.....	(67)
第二节 为政以仁——实现民本思想的途径.....	(81)
第四章 孟子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高峰.....	(87)
第一节 民本思想的内容.....	(87)
第二节 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118)
第三节 对孟子民本思想的评价.....	(134)
第五章 荀子君本思想中的民本因素.....	(139)

第一节	荀子是一个君本论者·····	(139)
第二节	君本思想中的民本因素·····	(157)
第三节	对其某些民本思想的评价·····	(164)
第六章	道、墨、法家的民本思想·····	(169)
第一节	老子的民本思想·····	(169)
第二节	墨子的民本思想·····	(178)
第三节	商鞅、韩非的民本思想因素·····	(190)
第七章	先秦民本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204)

《先秦民本思想》序

宋 祚 胤

民本思想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它萌芽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时代大放光彩，基本上趋于成熟。其核心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些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高峰。

司马迁在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讥讽孟子的民本思想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从汉代的文景之治，特别是唐代的贞观之治，却充分证明汉唐的杰出君主，无非是努力实践民本思想，才取得那样丰硕的政治成果的。

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然不是历史上民本思想所能够比拟的，但马克思主义是广泛地批判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而来，从这种意义说，民本思想在今天还有其应该加以弘扬的价值。

游唤民同志潜心于先秦文献有年，成果累累，在这样基础上完成了《先秦民本思想》一书，取材宏富，论证精辟，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以乐观其成，故愿为之序。

前 言

“民”这一概念在古代具有模糊性，有时指被剥削阶级，有时指剥削阶级的下层或在野者。但在模糊性中又包含着相对的确定性：三代至秦汉文献中的“民”，主要指以农业劳动者为主的被剥削阶级和属于被剥削阶级范畴的“国人”。本书所论述的正是以作为剥削阶级对立面的这类“民”为邦国社稷之本的思想。

书中就我国先秦民本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重点考察儒家，但也旁及道、墨、法诸家。

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至西周。当时一些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从桀、纣的亡国及现实斗争中，初步看到了民的力量，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和“敬德保民”（《尚书·康诰》），开始重视民的力量。但这时对民的认识尚处于直观阶段，因而只能说是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到了春秋，民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显示，思想家们认识到了民对君的制约性，“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并进而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6年），标志着民本思想有了较大发展。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和“为政以德”，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本理论，把民本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

想之大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把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标志着民本思想的成熟。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其他诸家——道、墨、法家也产生了民本思想或民本思想因素。这些，构成了先秦民本思想的大体系。

先秦民本思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它包括：

一、对君依存于民、民制约君的认识

君和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本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但最初的统治者们并不懂得，他们把自己的统治看成是上天和祖先的恩惠。商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所以他敢于放纵荒淫而丝毫不想到人民的怨恨。是人民群众的斗争，才使统治阶级认识到了自己对立面的存在，认识到君依存于民，民制约着君：

一是在经济上民对君的根本制约和君对民的最终依赖。物质财富是君国社稷的基础，国家之财，君之所用，皆出自民，“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国语·周语》上）。“（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国语·周语》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上）

二是民关系到君位的得失。“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得民，就可以世代为王。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得到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就可以作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位能否巩固，也要由民来决定。

三是民决定国家的兴亡。“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视民如土芥”（《左传》哀公元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国之兴亡，要由民决定；政权的巩固，也要由民的趋向来决定。结论是“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四是民决定战争的胜负。春秋、战国战争频繁，而战争的胜负，莫不取决于民心向背，“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争之所由克也”（《左传》成公16年）。相反，“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23年），民不与统治者合作，战争就会失败。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君民间的制约关系是相互的，而先秦民本思想则在君民间相互制约关系中强调民对君的制约。这标志着对民认识的深化。

二、承认民的地位和作用

“天生民而立之君”（《左传》襄公14年），君为民而立。这就包含了承认民的地位的思想。“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39章），下贱之民是君之本，国家的基础。这是对民的地位的承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是承认了民的地位。所以，

“夫民者，国之基也”（《潜夫论·本政》）。

民的地位和作用，更具体表现在：

一是在天民关系的问题上，承认国之兴亡不是决定于天，而是决定于民，从而把民的地位摆在天之上。“国之存亡，天也”（《左传》成公16年），国家的兴衰存亡由天决定，天是最高主宰。但进入春秋以来，否定天的思想有所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对卜筮的逐步否定，产生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18年）。与此同时，重人事（也就是重民）的思想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德”和“仁”的思想有所发展。当时一些杰出的思想家把德提到了重要位置上，“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24年），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仁”的思想更是兴起，“仁”字大量出现，《国语》中二十四见，《左传》三十三见。德、仁的核心是爱民。德、仁的份量愈加强，标志着民的地位愈上升。由于否定天的思想的发展和重人事思想的增强，从而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左传》庄公32年），
“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孟子·离娄》上），国之兴亡不是由天决定，而是由民决定。并进而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6年）神之主即天之主。这就肯定了民为主，把民的地位摆在天之上了。

二是在君民关系问题上，承认君是为民的，承认推翻暴君的合理性。春秋以来，由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正在迅速改变君王的实际地位，君王的绝对权威下降，民的地位迅速上升，提出了“民为君之本也”（《春秋谷梁传》桓公14年），从而出现了君为民的新观念：“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13年），“命在养民”（同上）。

君王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它的使命在于抚养民。于是，反对君主把自己凌驾于民之上，“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左传》襄公14年），对于不利于民的君主可“易位”（《孟子·万章》下），诛暴君被视为诛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三、提出了处理君民关系的思想

正因为“民”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新书·大政》）。因此，如何才能不致使民成为“覆舟”之患，便成了先秦民本思想研究的主题。先秦民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君民关系的主张：

一是在态度上要爱民、重民、不可轻民。要“视民如子”（《左传》襄公25年），“泛爱众”（《论语·学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还要“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要重民，不可轻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切不可麻木不仁，掉以轻心。并由谨慎而形成一种畏惧心理，甚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的地步。常常心存“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主张“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二是在经济上要富民。民或安或乱，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民富则安，民贫则乱，物质利益决定一切，“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如果“百姓足”（《论语·颜渊》），“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同上），

民就可做到仁。“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反之，就会“放辟邪侈”（同上），起来作乱而国危，“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于是，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

三是主张剥削有度，反对聚敛穷民。“蓄聚不厌，其积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国语·楚语》下）从而提出了“敛从其薄”（《左传》哀公11年）“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以此作为剥削的“度”，并把这个“度”作为“仁政”和“暴政”的分界线。

四是主张行仁政。仁政是由仁发展而来。仁发端于春秋，它是顺应奴隶解放而出现的新思潮。孔子把它发展为仁的学说，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发展为仁政学说。仁政学说可说是囊括了为民思想的全部内容，其核心就是要按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施政。这就使处理君民关系的思想具有了理论形态。

从以上不难看出，民本思想首先是指对君依存于民，民制约着君这种关系的认识；其次是承认民的作用和地位；再次就是处理君民关系的思想。它的实质是统治者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认识。统治阶级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一定的制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除了被剥削、被压迫“养君子”的义务外，也有自己的权利。如果忽视了他们的权利，就将受到惩罚。对统治阶级权利的限制和义务的明确以及对民权利的承认，这正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成果。

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新

兴阶级的产生、社会出现了大变革，“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32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同上）。在大变革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愈来愈显示了伟大的决定性力量，从而地位迅速提高。存在决定意识，民本思想就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

先秦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观民本思想发展史，民本思想一般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的、现实的斗争经验中所提出（也有个别的不是进步的甚至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家，由于其宇宙观突破了其政治观，也产生了某些民本思想，如老子等）。贯穿民本思想的主线是：要求君主重视民，采取开明的、有利于民的政策，以便调节君民矛盾，维护君民统一。但这种统一一般是进步的统一。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尔后的朝代处于上升阶段的、有作为的君主，总是从先秦民本思想中寻找思想武器，以便改良政治，巩固和发展政权；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从中寻找武器，揭露和批判当时的黑暗政治；有些农民运动，也打着“民本”的旗帜以宣传号令群众。先秦民本思想对近现代思想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近现代所提出的民主，也与先秦民本思想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民主与民本不是截然分开的，更不是对立的，民主是民本的升华。民主如果脱离了民本，那也只能是一种虚伪的民主。今天把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它固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先秦民本思想显然是接受这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民族土壤”。这些说明，民本思想并非仅具“保守性”，或“成为历史前进中一种惰力”，而是始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的、有生命力的思想。

第一章 殷商至西周——民本

思想的萌芽时期

我们论述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民本思想，是以《尚书》（不包括《虞书》、《夏书》因为它是后人的作品）、《诗经》、《史记》及先秦诸子有关记载为根据的。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出殷商至西周已孕育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可说是包含了未来社会一切民本思想的胚胎、萌芽。

第一节 民的地位开始提高

一、孕育着民决定国家兴亡的思想。对于夏桀、商纣的亡国，几乎历代都在对它进行总结，但最早进行总结的是《尚书》（《尚书》是上古时代帝王的训词、公告、誓词之类的文献）。夏桀为何亡国？“有夏诞厥逸（夏桀放纵他的过失），不肯感言于民（不肯慰勉、关心民），乃大庸昏（却大行淫乱）”，“因甲于内乱（习惯于用内乱之人——女人治理国家政事），不克灵承于旅（不能够很好地顺从民众）。罔不惟进之恭（无不迫使民恭恭敬敬地贡献财物），洪舒于民（使民深深受害）”，“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夏朝地位高的官员太不懂得保护民使民能生活下去），乃胥虐于民，（却竟

相对民施行暴虐”，因而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上天就大下光明美好的命令给成汤），刑殄有夏（诛灭夏代）”

（以上均见《尚书·多方》。以下本章引《尚书》只注篇名）。这就是说由于夏桀不关心民，大荼毒于民，官吏竞相虐待民，因而天就命成汤把夏灭亡了。这里表面上讲的是天灭夏，但实际上讲的是民使夏亡。这一点，在《汤誓》讲得更概括、明确，“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周秉钧《尚书易解》

（《岳麓书社》1984年版）注：“率遏众力，谓尽竭民之力也。”这就是说夏桀竭尽了民的人力、物力，损害了夏王朝。众民懈怠不和于君，并诅咒说你这个自比太阳的夏桀何时灭亡！我宁肯与你同归于尽！可见，夏桀已完全丧失了民心，民对他憎恨到了极点。这时，汤起兵伐夏，民渴望汤来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雨也”。（《孟子·滕文公》下）就这样，夏王朝很快灭亡了。这是说夏桀的亡国是由于失去了民。商纣又为何亡国？一是置民于不顾，“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依”（《无逸》），“厥命罔显于民”（《酒诰》），“罔顾于天显民祗”（《多士》），“越厥后王后民”（《召诰》）。这些是说纣王不知种田的艰辛，不知民的痛苦。他的王业不仅对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把民摆在后面。二是放纵酒色，惟腐朽生活是求，“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彞伤心”（《酒诰》）。就是说纣只是大行其淫乱之事，用燕饮丧失君王的威仪，民无不为之悲痛。对于纣放纵酒色，正如《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好

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姐己，姐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午，靡靡之乐。……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三是搜刮民脂民膏。纣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加紧对民进行残酷剥削，“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管子·形势解》），并采用刑杀手段多聚财富，“用×仇斂”（《微子》），以便“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史记·殷本纪》）这样，激起民的强烈不满，“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西伯戡黎》），民无不希望商纣亡国，并埋怨天为何不降下惩罚。从而到处是哀怨和愤怒，象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大雅·荡》）。“小民方兴，相为敌愾”（《微子》）。武王见商纣众叛亲离，“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于是起兵伐纣，纣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军全军覆灭，纣王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可见纣和夏桀一样，同样是失去了民而亡国的。所以《诗经·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后来由于丧失了民心，才丧失大命的。《诗·大雅·皇矣》进一步总结说：“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程俊英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对此注释道：“维，通惟，想到。二国，指夏、商。获，得。不获，指不得民心。”就是说，夏、商的亡国，是失去民心的结果。很显然，话虽没有这样明说，但包含这样的意思是显然的。

与此相反，保民、得民就能有天下，就能长治久安。

文、武为何得天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无逸》），文王做下贱的工作，从事修路和干田里的活，从而“知稼穡之艰难，和小人之依（知道民的痛苦）”（同上）。于是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同上），这样，文王在中年就接受了天的大命，“享国五十年”（同上）。武王呢，“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立政》），不敢废除文王合理的德，只是考虑顺从文王宽容之德，也就是继承文王为民的思想。武王伐商纣时，他对百姓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孟子·尽心》下），也是以安民为目的，从而得民而有天下。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为什么能长治久安？中宗“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就在于他们“治民祇惧（治理民众恭敬谨慎），不敢荒宁（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知小人之依（知道民的痛苦），能保惠子庶民（能够安定爱护民），不敢侮鳏寡（对于孤苦伶仃的人不加轻慢）”（以上见《无逸》），治理民认真而谨慎，能安民、惠民，从而得到民的拥护。到了西周末年，在一部分思想家中还能比较自觉地重视民的力量，这主要体现在《周易》一书中。《周易》是一部为周厉王复国提供战略、策略思想的书（见宋祚胤《周易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同人卦写武人“同人于宗”（六二），在一族之类聚集群众，要驱逐厉王。《周易》作者告诉厉王必须“同人于野”（卦辞），或“同人于郊”（上九），在广大范围内动员人民，反击武人，才会“大师克相遇（广大群众能和君王配合），”“先号咷而后笑（由先前的悲观失望转入到后来的欢欣鼓舞）”（九五）。这些说明